

中国文联出版社



刘禹锡谪居武陵

戴志传 著



I207.2
L717

刘禹锡谪居武陵

戴志传 著

中华书局出版

2003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禹锡谪居武陵/戴志传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 1

(诗墙之旅丛书)

ISBN 7-5059-4221-2

I. 刘… II. 戴…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7258 号

书 名	诗墙之旅丛书:刘禹锡谪居武陵
作 者	戴志传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小葵
责任校对	何 君
责任印制	蔡明慧
印 刷	湖南轻工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83 千字
印 张	7.78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221-2/I.3291
定 价	全套定价 308 元(本册定价 2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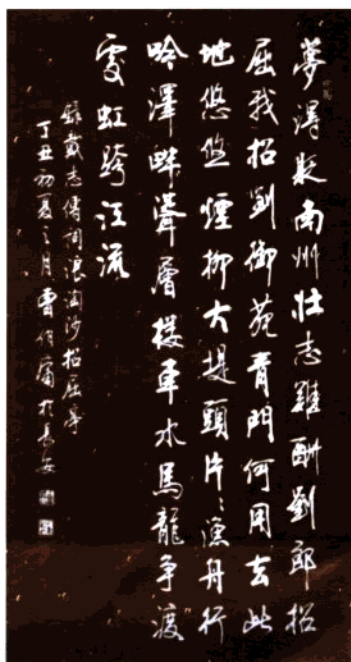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招屈亭——秦末郡人建立以招屈原，亭在常德市东门沅江大桥头，刘禹锡贬朗州十年居亭之旁。

(陈国安摄影)



浪淘沙·招屈亭

梦得贬南州，壮志难酬。刘郎招屈我招刘。御苑青门何用去？此地悠悠。烟柳大堤头，片片渔舟。行吟泽畔耸层楼。车水马龙争渡处，虹跨江流。

■曹伯庸书 刊刻于中国常德诗墙

弁 言

刘禹锡（公元772—842年），字梦得，原籍洛阳，生长在苏州一个中下层地主阶级家庭。他是唐代中期杰出的诗人、出色的散文家，同时也是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唐王朝在经“安史之乱”后由盛转衰的时期。宦官擅权，政治腐败，藩镇割据，危机四伏。为了改革当时的弊政，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巩固中央政权，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二月，三十三岁的刘禹锡以“忧国不谋身”（《学阮公体三首》）的精神，积极参加了王叔文领导的“内抑宦官，外制方镇”（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政治改革运动。他踔厉风发，才华横溢，“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旧唐书·刘禹锡传》），成为革新运动的骨干。失败后，他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就在这年的十一月底，刘禹锡怀着一腔忧愤，来到当时被称为“蛮夷卑湿”之地的朗州，直到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二月奉召回长安，在朗州度过了整整十个春秋。“枉渚（今常德德山孤峰下枉水入沅江处）逢春十度伤”（《朗州宴员外见示与澧州元郎中郡斋赠答长句二篇，因而继和》）！这是他对朗州逐客生活的形象描绘。然而，在贬谪的险恶政治环境中，刘禹锡仍坚强不屈，勇敢地拿起笔

来，继续与宦官、藩镇等守旧势力作斗争，创作了一百六十三篇诗文，为朗州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唐代文学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刘禹锡政治思想上坚持革新，在贬谪朗州后的诗歌创作上也极富创新精神，他谪居武陵期间写的大量寓言讽刺诗便体现了这一点。这部分诗歌，笔锋犀利，讽刺辛辣，锋芒所指是当时执掌朝政的宦官、藩镇等守旧势力，以及支持、纵容他们的唐王朝最高统治者。在《聚蚊谣》、《飞鸢操》、《百舌吟》、《养鸷词》、《白鹰》等寓言讽刺诗中，诗人善于捕捉一些动物形象的独具特征，托物以讽，把宦官、藩镇等守旧派以及他们的走狗的种种丑态，勾画得淋漓尽致！他笔下专伺昏暗、利嘴伤人的“聚蚊”，争食腐鼠、专横跋扈的“飞鸢”和迎风弄景、舌端万变的“百舌鸟”以及一味“哺之过笃”，用时“翅重飞不得”的鸷鸟形象，实质上指的是当时把持朝政的宦官权贵。至于那个残害弱小动物的“白鹰”，讽刺的则是他们所豢养的帮凶爪牙。对它们的贪婪本性和丑恶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笞。他的《昏镜词》、《磨镜篇》和《调瑟词》等诗，更是“讽托幽远”，讽刺的矛头直指当时宠信宦官、纵容藩镇、昏庸无能的唐王朝最高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唐时期宦官弄权、藩镇割据、朝政腐败的社会现实，表现了诗人坚持革新政治路线的进步立场和不屈的斗争精神。

刘禹锡谪居武陵期间的诗歌创新精神，突出地表现在他重视向民歌学习，翻作新词，创作了一种新型的民歌体诗。如《采菱行》、《竞渡曲》、《畚田行》、《竹枝词》、《踏歌词》、《堤上行》、

《浪淘沙词》、《潇湘神》、《捣衣曲》、《蛮子歌》、《纥那曲词》等民歌体诗，具有题材多样，形式新颖，节奏和谐，语言明快的特点，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成为唐代诗歌中别开生面的作品。他的这些新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体现出他的革新精神，颇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据史载，当时“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词也”（《旧唐书·刘禹锡传》）。象“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竹枝词二首》）、“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其七）等佳句，至今仍为人们所称美传诵。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曾高度评价刘禹锡等唐代进步诗人在采录和润色《竹枝词》、《柳枝词》之类民歌方面的历史贡献。刘禹锡重视向民歌学习，“俯于途（道路），惟行旅讴吟是采”（《武陵北亭记》），并对《竹枝词》等民歌进行一番认真的改写工作是从贬朗州后开始的。朗州十年，是他学习民歌、翻作新词取得丰硕成果的十年。无疑，这在他诗歌创作道路上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刘禹锡谪居武陵期间，遍访当地名胜古迹，在朗州这块渗透古老文化的土地上，留下了他的光辉足迹和歌咏的诗篇，如《善卷坛下作》、《登司马错故城》、《经伏波神祠》、《汉寿城春望》、《游桃源一百韵》、《武陵书怀五十韵》等，都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很好的怀古咏史之作。他的这些怀古咏史诗，不是为怀古咏史而怀古咏史，也决非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针对现实的政治斗争而发的。诗中，或揭露革新失败后宦官权贵把持朝政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危机；或抒发受谪遭贬的愤懑和不屈的志节；或表达对革新路线的坚持与渴望变革现实的积极进取精神等。他的

“一以功名累，翻思马少游”（《经伏波神祠》）、“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汉寿城春望》）等名言，即出自朗州的怀古咏史之作。

刘禹锡谪居武陵期间写的抒情酬赠诗，亦备受后人推崇。如《答杨八敬之绝句》、《敬酬澈公见寄二首》、《秋日送客至潜水驿》、《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朗州宴员外见示与澧州元郎中郡斋赠答长句二篇，因而继和》等诗，写出了诗人与友人之间笃厚的情谊，极富感染力。

刘禹锡谪居武陵期间，在散文创作上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从《刘禹锡集》中现存的二百二十一篇散文看，写于永贞革新前的散文，多为表章、状、启之类的应酬文字，艺术上也不可取，几乎没有能代表他散文成就的作品。贬到朗州后，使他有更多机会和时间接触社会，了解下层人民，从而加深了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写出了三十七篇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很强的散文作品。他那些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如《天论》三篇、《华佗论》、《辩迹论》、《答饶州元使君书》、《救沉志》、《机汲记》、《武陵北亭记》以及《陋室铭》等，都写于谪居武陵期间。

他这一时期的散文成就，首先表现在论说文的写作上。他说“子（指韩愈）长在笔，余长在论”（《祭韩吏部文》）的话。确实，他的论说文写得非常精彩，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也高出于他的同辈人。他的哲学代表作《天论》三篇、《华佗论》、《辩迹论》、《明贵论》、《答饶州元使君书》、《答容州宴中丞书》等论说文，观点鲜明，论证缜密，词采丰富，且长于取譬，具有很强的辩说力。其次，他的记叙性散文，亦具有风格清新自然，语言简洁明

丽，写景状物形象生动等特色。如《救沉志》、《机汲记》、《复荆门县记》和《武陵北亭记》等。另外，他贬朗州后的书信、集纪、杂著、祭文等，大都写得文情并茂，感染力强，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如《上杜司徒书》、《答柳子厚书》、《董氏武陵集纪》、《伤我马词》、《绝编生墓表》、《故荆南节度推官董府君墓志》等。有的就是优美的抒情散文，象《伤我马词》、《绝编生墓表》等。他的挚友柳宗元曾用“文雋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述越戒》）来概括他散文的特色是很有道理的。

刘禹锡谪居武陵期间，受屈原赋的影响很深，在赋的写作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刘禹锡集》现存的九篇赋作看，除《问大钧赋》、《山阳城赋》、《秋声赋》三篇外，《砥石赋》、《何卜赋》、《楚望赋》、《伤往赋》、《望赋》、《谪九年赋》等六篇，都写于谪居武陵期间。他的《砥石赋》、《何卜赋》、《楚望赋》，深得人们好评。

从刘禹锡谪居武陵期间在哲学、文学等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看，他堪称是唐代中期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杰出的诗人和出色的散文家。当然，我们在正确评价刘禹锡朗州诗文创作的成绩及其进步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作为中下层地主阶级革新派的刘禹锡，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比如在哲学思想方面，他虽力图从自然和社会现象中去探求“天命论”、“有神论”产生的原因，但最后却把原因仅仅归结为人类的明昧和社会的治乱，而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阶级的根源这一点。又如他对佛教的唯心主义斗争不力，在谪居武陵的后期，与名僧禅师交游唱和，写了一组送僧诗，诗中也夹杂有禅理的内

容，佛教的某些消极思想表现得较为突出，这是应当予以剔除的。但这毕竟不是他的主流。“十年憔悴武陵溪”（窦巩《送刘禹锡》）。刘禹锡谪居武陵十年，确实经历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竭蹶的岁月。然而，他坚强不屈，勤奋创作，在其作品中形象地反映了朗州的山川风物、历史文化，展现出素有文物之邦雅称的武陵古郡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这样说，武陵十年，是刘禹锡整个创作生涯中一个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文，是《刘禹锡集》的主体和精华，是他留给武陵人民的一笔珍贵而丰厚的文化遗产。为了彰著刘禹锡对朗州文化的卓越功绩，中国常德诗墙镌刻了他的朗州诗词共十三题、十七首，为常德诗墙刊刻古代作家诗词之冠。耸立在常德城青年路闸沅江防洪大堤上的“排云阁”，是近年常德市人民政府以他的诗句（“晴空一鹤排云上”）命名兴建的一座气势恢弘的阁楼。由此可见，常德人民对这位先贤的崇敬与缅怀！

公元2002年，是刘禹锡诞生一千二百三十周年，谨以这本小书纪念他对朗州文化所作的巨大贡献。

作者

2001年10月

目 录

弁言	(1)
“滴在三湘最远州”	(1)
“昔日居邻招屈亭”	(12)
“我心如砥柱”	(23)
“一息不肯桃源住”	(34)
“农夫何为者,辛苦事寒耕”	(40)
“我孤尔众能我伤”	(49)
“周览壮前躅”	(58)
“阳山庙观赛神”	(67)
“怒人言命,笑人言天”	(74)
“我言秋日胜春朝”	(85)
“昨闻凯歌旋”	(95)
“虽氓谣俚音,可偏风什”	(102)
“结友心多契”	(112)
“纷百哀而攻中”	(142)
“望如何其望最伤”	(146)

“武陵樵客蹶仙踪”	(155)
-----------	-------

附 录

刘禹锡朗州诗文考释	(159)
略论刘禹锡在朗州写的诗歌	(187)
谈刘禹锡的朗州民歌体诗	(195)
略论刘禹锡的朗州散文	(205)
刘禹锡朗州诗文系年	(214)
后记	(242)

“谪在三湘最远州”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人们最初知道刘禹锡，多缘于他这首脍炙人口的《竹枝词》。可是，对诗人的坎坷生涯，特别是对他青年时期谪居武陵（湖南常德市），人们则所知甚少。这首千百年来家传户诵的《竹枝词》，便写于他谪居武陵期间。刘禹锡从唐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十一月贬朗州（湖南常德）司马，到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二月应诏回京都长安（陕西西安），在朗州度过了整整十个春秋。这里讲述的，是他“十年楚水枫林下”（《元和甲午岁诏书尽征江湖逐客，余自武陵赴京，宿于都亭，有怀续来诸君子》）的谪居生活与创作。

刘禹锡（公元772—842年），字梦得，原籍洛阳，生长在苏州一个“世为儒而仕”的中下层地主阶级家庭。“曾祖凯，官至博州（山东聊城）刺史。祖锓，由洛阳主簿察视行马外事，岁满，转殿中丞、侍御史，赠尚书祠部郎中。父讳绪，亦以儒学天宝末应进士。……后为淮西从事，本府就加盐铁副使，遂转殿中，主务于埭桥（安徽宿州市南）”。“禹锡既冠，举进士，一幸而中试。间岁，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子刘子自传》）。刘禹锡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与柳宗元同榜登第，于当年登博学宏词

科。按照唐代科举制度，只有通过吏部取士科考试合格者，才授予官职。刘禹锡于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从此，他开始涉足官场。

刘禹锡生活在唐王朝“安史之乱”后由盛而衰的转变时期。当时，“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册府元龟·田制》）。“聚敛之臣，剥下媚上，惟思竭泽，不虑无鱼”（《旧唐书·李渤传》）。地方藩镇割据势力日益猖獗，拥兵自重，独霸一方，经常发动叛乱，严重威胁唐王朝中央政权。朝廷内的大宦官集团和大贵族官僚集团则与藩镇相勾结，控制着唐朝中央的军政大权。他们朋比为奸，横行无忌，不但可以随意任免朝官，而且还决定皇帝的废立。他们利用所谓“宫市”，明火执仗地抢夺百姓财物。疯狂的兼并，残酷的掠夺，苛重的赋税，严重地损害了中下层地主阶层的利益，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从而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民弗堪命，是轶于他土”（《讯毗》）。逃亡，是当时农民最普遍的一种反抗方式。唐代宗李豫时期，农民流亡，有“户口十不半存”的记载。到唐德宗李适贞元年间，百姓逃亡更为严重：“诸州户减耗，三分去二”（《册府元龟·户籍》）。早年，刘禹锡在《讯毗》中就记述了他从扬州回长安，途经徐州所看到的大批农民逃亡的情景：“刘子如京师（去京都长安），过徐之右鄙（西郊）。其道旁午（纵横交错），有毗（农民）增增（很多），扶斑白（头发花白，指老人），挈羈角（携小孩），赍生器（带着生活用具），荷农用（扛着农具），摩肩而西（肩挨肩地往西走去）”。有不少逃亡户还被迫落入豪强地主手中，沦为失去人身自由的奴仆。人口大量逃散后，沉重的赋税便落在未逃亡户的身

上，从而加速了他们的破产。随着压迫与剥削的加深，大地主阶级与农民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从唐代宗时起，中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远自江南，近在京洛，此起彼伏。如唐代宗大历末年湖南有王国良等的起义，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长江下游有所谓“江贼”活动。特别是浙东袁晁领导的农民起义，有组织的队伍就达二十多万人，连续攻下了浙东衢、信、温、明等州，建立了农民政权，改元“宝胜”。这对以江南为主要来源的大唐财政收入造成严重威胁，并猛烈地冲击着唐王朝的腐朽统治。

为了改革当时的弊政，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巩固中央政权，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二月，三十三岁的刘禹锡以“忧国不谋身”（《学阮公体三首》）的精神，同柳宗元等一起参加了王叔文、王伾领导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革新运动，因为在“永贞”年，故史称“永贞革新”。他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出众的才华，“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史判官”（《旧唐书·刘禹锡传》），成为革新集团的骨干。刘禹锡与柳宗元在这次政治革新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时称“三王、刘柳”。革新集团借助刚即位皇帝顺宗李诵的支持迅速掌权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弊政的措施：“内抑宦官，外制方镇”，并力图“摄天下财赋兵力而尽归之朝廷”（《十七史商榷》）；罢了“不循法度”、无恶不作的京兆尹李实的官；整顿税收，免除历年积欠赋税，迅速控制了盐价；取缔宫市（为皇宫购物的太监购物时随意给价）、禁止五坊小儿（为皇宫饲养鹰犬者扰民）；释放宫女、女乐等。这些革新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宦官、藩镇势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负担，受到社会上的广泛赞同，

当时长安城内出现了“市井欢呼”、“人情大悦”（《顺宗实录》）的局面。正如《十七史商榷》所评价的，“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但是，改革引起宦官、藩镇和贵族官僚集团的极端仇视。这年八月，藩镇韦皋和大宦官俱文珍等勾结起来，迫使唐顺宗让位于太子李纯（宪宗），这场改革的烈火，在进行了一百四十六天后被扑灭了。接踵而来的，是大地主守旧势力对革新集团成员的疯狂迫害，朝廷上下，京城内外，“吠声者多，辨实者寡”（《上杜司徒书》）。一时流言四起，飞谤横生，甚嚣尘上！王叔文遭杀害，王伾被逼死，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等八名骨干被逐出朝庭，贬官流放到远州当司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从此，刘禹锡开始了长期的贬谪生涯。

在唐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十三日，朝廷贬刘禹锡为连州（广东连县）刺史。在宦官、藩镇等守旧势力的高压下，刘禹锡带着有身孕的妻子薛氏，离开喧嚣的京都长安，往洛阳方向去贬所。他为什么取道洛阳而不直接南下？这是因为他“家本荥上，籍占洛阳”（《汝州上后谢宰相状》），在洛阳附近有旧宅。他母亲卢夫人，系北方人，“不乐江淮间”（《子刘子自传》）。他父亲刘绪主务埭桥时，卢氏因不习惯南方生活，亦未随同前往，一直住在洛阳附近之旧宅。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春，刘禹锡“擢进士第，又登宏词科”后，就是先“归洛阳省母”，再“去埭桥省父”的。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刘绪卒于扬州，刘禹锡扶柩葬父于洛阳“荥阳之檀山原”（《子刘子自传》）。在洛阳丁父忧期间，即与母亲住在一起。从刘禹锡早年写的《奉送家兄归王屋山隐居二首》